

【理论探讨】

## 《黄帝内经》隐喻产生原因探析\*

陈 战,刘桂荣,刘晓杰<sup>△</sup>  
(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 250355)

**摘要:**《黄帝内经》中出现大量隐喻有着认知、心理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认知需要是《黄帝内经》中隐喻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当时科学水平和认知方法的局限,人们自然会通过隐喻来表达各种抽象概念,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心理方面来看,当时的思维和语言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医家们被迫选择隐喻的思维方式,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认知和表达抽象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疾病规律,使得人们在心理上轻松自在。《黄帝内经》时代的语言有限,人们借助“以己度物”的隐喻思维和认知方式表达特定概念或者新概念,揭示隐喻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揭开中医语言的神秘面纱,了解中医学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思维方式,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医学。

**关键词:**《黄帝内经》;隐喻;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 R2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0)01-0005-03

###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metaphor in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CHEN Zhan, LIU Gui-rong, LIU Xiao-jie<sup>△</sup>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metaphors in the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has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easons. Cognitive need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metaphors in i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methods at that time, people naturally expressed various abstract concepts through metaphors. 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thinking and language at that time were not as developed as now. The physicians were forced to choose a metaphorical way of thinking, using familiar things to recognize and express abstract human physiological, pathological phenomena and disease laws to make people psychologically comfortable. The words at that time were so limited that people used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cognitive style to express specific concepts or new concepts. Revealing the causes of metaphor helps to uncover the mystery of TCM language, understand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a and ways of thinking of TCM, learn and understand Chinese medicine furtherly.

**Key words:**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Metaphor;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是古代劳动人民与各种疾病长期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中提出诸多重要的关于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原则,是中医学得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精髓,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隐喻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人类在不断认知和建构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内经》中使用了大量的类型各异的隐喻,恰恰体现了古代哲人和医家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和思考。《内经》存在大量的隐喻,既有认知方

面的原因,也有心理和语言方面的原因。探索隐喻产生的原因将对研究中医学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 1 认知原因

在传统修辞学看来,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其实隐喻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sup>[1]</sup>。这种“隐喻认知观”,使得隐喻研究实现了从修辞到认知的巨大转变,对隐喻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认知需要是隐喻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类早期的认知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较低,而且认知方法有限,因此可能会需要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和想法,其中就包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和理解。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人们逐渐经历了从根隐喻(尚未意识到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的差别,误将本体视为喻体)到新隐喻(开始意识到本体与喻体有所不同),再到明喻(清楚地认识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的异同)的发展过程。格特鲁德·巴克曾经举例来说明隐喻的发展过程“牙齿就是珍珠——珍珠般的牙齿——她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ZH017)-基于语料库的《黄帝内经素问》隐喻英译对比研究;山东省2015~2016年度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5-003)-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黄帝内经素问》隐喻研究;2015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J15WD31)-中医典籍翻译的文化缺省及补偿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英译及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陈 战(1980-),男,山东微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文化传播及英译研究。

△通讯作者:刘晓杰(1978-),女,山东临朐人,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研究,Tel:13065066350,E-mail:liuxiaojie2004@126.com。

牙齿像珍珠一样”<sup>[2]</sup>。在第一阶段,人们没有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牙齿和珍珠),甚至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同一的,即认为“牙齿就是珍珠”(Teeth are pearls);在第二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和比较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同,即已经分辨出珍珠和牙齿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二者只是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于是出现了“珍珠般的牙齿”(pearly teeth)这样的表达;在第三阶段,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两种事物之间不但存在区别,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联系,即能够清楚地分辨出牙齿和珍珠,认知也更为全面细致,同时还使用“仿佛”“好像”“犹如”(as, like)等喻词来说明这种联系,因此也就出现了下面的表达“她的牙齿像珍珠一样”(Her teeth are like pearls.)。显然,第一阶段(根隐喻)说明,人们的认知水平并不完善,认知能力有待提高,但这也从侧面验证隐喻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也验证了莱考夫和约翰逊“隐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手段”<sup>[3]</sup>的观点。

《易传·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4]</sup>《素问·示从容论篇》亦云:“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由此可见,在《内经》形成的时代里,由于科学水平较低,认知方法也很有限,人们很自然地会通过隐喻来表达各种抽象概念,借助比较熟悉的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来认识生命和疾病,阐述医理,即前面提到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在利用“取象天地,效法万物”的隐喻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并用来表达抽象概念。

以中医学的阴阳和五行概念为例。这两个概念均来源于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具体体验,是在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逐渐加深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越来越抽象的思维过程中,阴阳概念不断得到扩展和延伸,逐渐被用来阐释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对立统一的两面,而五行亦是如此,逐渐被用于阐释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阴阳和五行概念具有十分广泛的运用。可以说,它们是古人对周围世界一切事物进行分类和组织心理表征方式。具体到中医学方面,古代医家将阴阳和五行概念所蕴含的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人体的生理结构、生理功能、病因和病机等较为抽象的认知域,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中医隐喻语言,从而构建出中医学的阴阳和五行理论。这些理论将人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将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归结其中,能够执简驭繁地说明人体的生理结构、功能和各种疾病等。阴阳和五行理论的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古代医家对人体生命和疾病规律的认知方式和分类方法,对于建

构中医抽象概念、说明人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理解和运用中医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的许多传统医学和最初的西医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隐喻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虽然中医学的理论与其他医学有很大不同,但是一直以来都在发挥着防病治病的作用。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很多传统医学都已经消亡,但是中医学依然在为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这当然离不开“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中医学的隐喻思维,也与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坚守密切相关。良好的防病治病效果确保中医学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如果缺乏这一点,中医学至多只是一种文化,而不能成为一门医学。

## 2 心理原因

认知因素可以反映人类共同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方式,而心理因素则反映人脑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似性是隐喻产生的基础,在认知心理学中,隐喻的产生过程相当于一个模式识别的过程,即人脑首先已经产生了对某个模型的记忆,然后再将刺激物与该模型进行对比,并比较其相似性,从而得出结论。心理学认为,人们通常会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认识陌生或抽象的事物。这样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时,往往会因为熟悉的、已知的、具体事物的帮助而产生“轻车熟路”的感觉,从而在心理上感到轻松自在<sup>[5]</sup>。

实际上,隐喻是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必然需要,因为隐喻在本质上倾向于探索和发现不同认识领域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理感觉<sup>[6]</sup>。另外,由于隐喻的产生离不开相似性,因此能够产生某种亲和力,化异为同,使接受者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感<sup>[7]</sup>。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隐喻的方式,以相似性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内经》时代,思维和语言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奈之下,古代医家们被迫地选择了隐喻的思维方式,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认知和表达抽象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疾病规律。另一方面隐喻产生的基础是相似性,因此在认知的过程中,可以使人们在心理上轻松自在,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触发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因此,对于古代医家来说,隐喻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可以说,《内经》时代的医家们借助隐喻的思维方式建构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行而且又较为理想的选择。

## 3 语言原因

隐喻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虽然各种语言的词汇都比较丰富,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但是都不可能完全包含外部世界和人类大脑中的所有情景和想法。当人们需

要表达新的经历和情景时,如果无法使用语言中的现成词语,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借用某些存在已有的词汇和表达来替代。在替代的过程中,如果导致某种误解的出现,人们可以运用隐喻等语言手段予以消除<sup>[8]</sup>。换言之,在说明某一新概念时,如果现有词汇中没有对应的词语,人们往往会借用现成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就会导致语言中出现大量的隐喻性词汇,即具有隐喻意义的词语。从大众的心理角度来看,隐喻的使用与“求新”“求异”等有关<sup>[9]</sup>。隐喻产生还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有一定关系。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隐喻是实现思维经济性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思维的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隐喻的产生。由于语言在不同的结构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隐喻性,因此数量有限的语言形式才能够得到无限的拓展和应用<sup>[10]</sup>。但语言的表达会受到语言有限性的限制,而且人具有自然的情性,因此在交际时人们往往都会选择双方都熟悉的语言。在希望表达复杂概念和表达尽可能便捷的矛盾作用下,语言才能够不断地发展。隐喻就是这种发展的最明显产物。

在《内经》时代,古代民众就是借助“以己度物”隐喻的思维和认知方式,通过具体、熟悉的意象给万事万物命名<sup>[11]</sup>。限于当时有限的语言,在表达特定概念或者新概念时,现有语言中缺乏合适的词语,人们不得不以隐喻的方式借用已有的词语。由于当时科学水平有限,对人体和自然界的事物缺乏深入的了解,所谓“以己度物”也不过是将表达人体或周围事物的说法直接用于表达其他事物,于是便有了“桌腿”“河床”“山头”“山脊”等说法。在认识人体和疾病时,由于缺乏相关的词语与表达,先民们也不得不采用“以物度己”“远取诸物”的隐喻方式,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这样《内经》便产生了诸多隐喻表达。隐喻的思维方式广泛地应用于命名中医学的一

些基本概念。如“藏府”原本用于表示仓库、官府,被用于表达人体器官;“经络”原本用于表示自然现象,被用来指代人体生命通道;“权衡规矩”原本用于表示生活用具,被用来形容四季脉象;“君臣佐使”原本用于表示古代官制,被用于说明遣方原则等。

《内经》中的大量隐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体现了古代哲人和医家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和思考,是更好地理解中医语言和中医知识的法宝。研究《内经》隐喻的产生原因,有助于揭开中医语言的神秘面纱,了解中医学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思维方式,为研究和分析其他典籍提供了相似的途径,对更好地理解其他中医典籍中的语言、弘扬中华文化瑰宝提供宝贵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
- [2] BUCK G. The Metapho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6.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
- [4] 王弼. 周易注疏[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0: 256.
- [5]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92.
- [6] 张沛. 隐喻的生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
- [7] 王霜梅. 汉语定中结构的认知隐喻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124.
- [8]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09-110.
- [9] 束定芳. 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J]. 外语学刊, 2000, 24(2): 23.
- [10] 杨静文. 从隐喻看语言变化中经济性和冗余性的平衡[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0(S1): 254-256.
- [11] 维柯. 新科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222.

收稿日期:2019-06-11

(上接第1页)

一次突破,创造了新理论和新的治疗方法。

医家不断沿着张仲景的理路来概括“平脉辨证”的全过程。最早有南宋·陈无择者,在其所著《三因方》中,用“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10个字来统括之。按简易大易从简的趋势,后世医家不断将此10字化简为4字句。明·徐春圃在《古今医统》中简为“因病施治”;明·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称为“辨证施治”;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谓为“诊病施治”;清·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称为“见证施治”;至清中有医家陈惠民和章虚谷分别在其著作《证治新义》《医门棒喝》中使用了“辨证论治”一词,由是而为医界所习用。

清末民初至今,辨证论治进入了转型期。一是“辨”的对象展扩为辨证加上诊病,即通言之“辨证

与辨病”相结合,这就使传统的辨证思维复杂化了。辨证是判别辨的思维方式,而“辨病”准确地说应该叫做“诊病”,引进了西医学的归纳思维方式。二是特异性辨证内容的增多(或者称为特征值),使辨证论治成为规范性与特异辨证的统一体。三是吸收和引进了西医学所用乃至现代多种学科技术于临床诊治中,发展起微观辨证和影像学辨证等,使辨的内容更加丰富。辨证与诊病相结合是建立一个中医理论框架中吸纳了西医病的概念,可堪为中西医结合的一种形式。可以说,中西医结合是由辨证论治的发展开始,是理论的补充和诊治方法的丰富,大大增益了辨证论治的能力和普适性。发展为病证结合的多态体,是辨证论治第三次突破的标志。罗素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多态,这也是辨证论治的发展前景和价值所在。